



口述 抗战史



吕正操 辽宁海城人(1905—2009)。1922年参加东北军,次年入东北讲武堂学习。毕业后任东北军连长、营长,647团、691团团长。抗战期间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、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、晋绥军区司令员、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等职。

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,我回自己部队,我这里有党的组织,有把握,我说我不跟着争权夺利。所谓少壮派,张学良一走就没办法,那些老的军长还都有旧势力,最后闹出来他们少壮派一定要蒋介石放张回来,不愿意就要打,打内战周恩来不赞成,中央也不赞成。

七卢沟桥事变后,我部队的一个书记长,叫李小初(音),是中共陕西省委派到我那里去的,他传达意见不要拉出去,跟地方党结合起来,开展游击战争。华北的地形我熟,因为我北平也驻过防,一直到石家庄我们都驻过,我们也事先做过山地演习、平原演习。

梅花镇惨案

(当时东北军)主力部队都跑了,我们部队留在那里,跟日本人打,营长连长都有牺牲的,共产党员都坚决守在那边。

石家庄附近有个叫梅花镇,梅花镇打仗的时候,其他部队一打又跑掉了,那里有城墙,光留下来一个营守这边,打了差不多一



■ 1940年5月于八路军总部,右起聂荣臻、朱德、彭德怀、吕正操、罗瑞卿

天,就被敌人包围了。敌人费很大劲攻城没冲进去,以后我们看到继续打下去不行,我就另派部队,打开缺口把部队接应出来。这一仗打死敌人大概七八百人,尸体遍地。我们伤亡人数并不多,40多个人,叫老百姓把伤员抬出来。(当时)我们有一个排长到处喊,你们赶紧跟我们走,不走日本人会杀,许多老百姓不相信,只有给我们打开东边城门的老百姓跟我们跑了几百人,还有的抬担架的,他们活过来了,剩下的被敌人几乎杀光了。他那儿2500口人,杀死了大概一千五六百人,惨的很。怀孕的妇女肚皮给挑开了,拿刺刀把小孩挑出来,惨不忍睹;井里填满了尸体,有一个人挨了刺刀11刀没死,死过去了以后又活

过来了,成了一个残疾。当时活下来的人现在存在的还有四、五个。这就是梅花镇惨案,由此更加激起冀中平原的抗日烈火。

我们等晚上撤出来以后,带部队回到晋县小樵镇。我们进了镇以后决定改编,不要叫东北军了,国民党东北军在群众里头影响不好,改称“人民自卫军”。

正在晋西山内的中共晋察冀军区听说有一个部队是东北军留下的,他就派在我们团做过工作的孙志远(音)来找我了。接触的时候,我跟聂荣臻要求,带着我们的部队,跟红军学习一个时期。1937年,这年中间去了一个月就回来了,我们就跟地方党组织都连起来,组织了八路军第三纵队,建立了冀中军区。

跳出包围圈

1942年以前,每年春秋两季都有敌人“扫荡”。那时候,我们冀中就是依靠老百姓,敌人在据点里头的情况我们都知道,我们很主动的。比如说冀中那个地方,把狗都杀光了,在(敌人)据点里头也没有狗,因为我们晚上行动狗一叫,敌人就知道有部队,所以我们就动员老百姓杀狗,那冀中老百姓他们觉悟真高,你只要为抗日,什么都豁出来,所以我们在冀中都是晚上行动,也很自由。

敌人有机化部队、装甲车什么的,我们把所有道路都挖成坑了,他们装甲车走不了,只能走大车。敌人附近的地方,斗争比较残酷的地方,我们开始搞地道战。每年春秋两季大扫荡,规律我们都了解得很清楚,敌人进来,我就到他后头去,可以打就打。到1942年5月大扫荡,日本下了大决心,冈村宁次要消灭冀中的(八路军)主力部队,因为冀中有物力、财力,人口众多,有800万人口。那个时候我事先也知道敌人部队的调动位置,我们在敌占区都有群众工作,哪里有汉奸,我们都可以哪里拉出来把他杀掉。所以冀中这个地方,我说最有功就是老百姓,真是一心一意抗战。

5月大扫荡那个时候,敌人什么动静我们都知道。我们还在,敌人要到我们司令部的时候,演了一个话剧,是《雷雨》还是《日出》,就是把灯光给他看,演了剧,我们过了滏阳河,还有石家庄到德州的铁路,我们想跳出这个(包围圈),滏阳河以东,就到了敌人比较紧张的地方。我们经验就是,哪个地方敌人势力越强,等一到扫荡的时候,那个地方最吃紧,我们

就跑到那个地方,就在津浦线附近,运河边上,就在炮楼底下休息,看着他,鬼子不敢下来,因为它大部分部队都到里头(扫荡)了。

开展地道战

敌人每次“扫荡”,把老百姓家里杀光、抢光、烧光,冀中老百姓家里看不到什么东西,最残酷的就是,见着人就杀,所以冀中老百姓是靠着地道活过来的。地道最先是离保定很近的冉庄地道,敌人经常出来,没办法搞了一个地道,以后在冀中普遍地开展起来了,敌人来就钻地道,开始是一家一户搞地道钻起来,以后几户连到一起,一个村子连起来,跟外村也连起来。

1942年“扫荡”时,冀中蠡县有一个地下山区,完全在地下,敌人在地上,原来那里走到哪都是在地道走,就是大冉庄那边。“五一扫荡”以后我们普遍开展起来。以后敌人在地道口放毒气,几百人死在那里,再以后也有经验了,敌人一进放毒,我们就堵洞口,办法也多了,小队民兵跑到村子外头包围敌人打。“五一扫荡”以后,在冀中几乎村村冒烟,家家戴孝,没有一家不死人的。群众非常坚决,那个时候,冀中还有“一把剪子运动”,每个妇女都准备一把剪子,敌人要强奸,跟敌人一起死。大概1942年是最残酷了。以后,我们部队主力也转移出来了,到1943年就缓和了,1944年据点的敌人逐渐被抽走了,剩下都是伪军,那伪军地方老百姓就做工作,那个时候我们是两面政策,伪村长是我们的人给他当村长,内部情况我们都知道。

(根据杨克林、孙金媛1995年3月22日北京采访录音整理)

记忆中的抗战 征文

我的祖父高凌百先生1900年生于江苏江阴,1922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。在他1936年9月至1946年4月出任中国驻新加坡代理总领事、驻新加坡总领事期间,正是国内抗战最艰难的时期,也是他殚精竭虑尽职尽责的岁月。

肩负重任
发动侨民募款救国

世界各地的华侨数南洋最多,侨史最长。由于各侨团的文化差异大,结团宗旨随其政治背景的不同而不同,相互之间难免会出现猜疑和摩擦。

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下,祖父身为国民政府驻英国殖民统治南洋诸国的最高长官,肩负着筹款救国重任,他深知唯有团结各侨团,才能同仇敌忾。为此,祖父经常与当地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领导的侨团互动,统筹和均衡领区内各侨团援助国内抗战活动,如声援和慰问罢工抗日的铁矿华工等。他坚持同为华人、共同抗日为原则,无论是亲共的陈嘉庚、中立的刘海粟和徐悲鸿,还是国民党



■ 滇缅公路险峻的二十四道弯

的吴铁城,只要是支援国内人民抗日的活动,祖父都会争取亲自参加,并通过报纸报道共同抗日的主张。在祖父和总领馆的姚竹修(烈士)、季步飞等多位外交人员的积极参与和引导下,当地侨界和艺术界纷纷发动侨民慷慨解囊,筹款救国运动此起彼伏,抗战物资通过马六甲海峡,经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运回国内。

为国育才
致力华侨教育事业

来到南洋,祖父感到宣传抗日思想,教育青年人的重要。为此,祖父多次与文化教育界的朋友讨论,多开展一些抗日教育和宣传活动,并常去当地华侨中学看望师生,还专门题词“为国育才”以勉励师生。对于华侨子女就学生活遇到的困难,他积极通过总领馆给予协调帮助,为抗战救国和促进南洋华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奔波。

为鼓励南洋华侨青年回国抗日,祖父以身作则,毅然决定把在新加坡生活了多年的两个儿子送回国内,与全国军民共同抗敌。

祖父深知,这一送很可能就是生死别离,仍强压不舍之情,亲自送别。父亲回忆离别新加坡时,祖父把他哥俩领到总领事办公室,在蒋介石送给祖父《大道之行、天下为公》的亲笔题词下,让签证官给父亲和二叔颁发了中国护照和回国签证,再三叮嘱他们要好好为国效命。就此,两个华侨

青年冒着日军空袭轰炸的危险,经滇缅公路踏上了回国抗日的征途,接受了抗战洗礼。

处危不乱
安全护侨撤离新加坡

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和国内战事不断恶化,总领馆接到中国外交部紧急撤侨闭馆的密电命令。此时,部分国土已遭日寇侵占,国民政府无力派遣军队协助,撤侨工作只能依靠领馆人员及侨团。而此时,日本已从海上逼近新加坡,随时会从海上包抄,封锁航道。这一来,撤侨的任务更是紧张繁重。在这危急时刻,祖父不顾自身安危,在总领馆与所有同仁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,帮助每一位撤离的侨民办理手续、为众多侨民补发和签发护照、租调撤离船只、清理文件和转移物资……经过数天拼争,终于在最后期限内提前一天时间完成任务,为侨民的安全撤离争取了宝贵时间。

1942年2月13日,祖父和总领馆人员才乘小船撤离。为确保小船安全,祖父站在船头用一架

单筒望远镜观察着水面,指挥船员避开水雷、暗礁和残物,好不容易上了去澳大利亚的船,逃过了日军攻占新加坡后的大屠杀。

不愿内战
弃官还民不离祖国

抗战胜利后,祖父不想枪打自己同胞,就随蒋介石夫人出访美国等地。1946年4月,国共两党关系越来越紧张,他作出一个全家想不到的决定——与国民党政府决然割裂,弃官还民。

1948年,国民党军队节节失守,权贵们纷纷抛售房地产、收拾细软远走高飞。这时,接到出国通知的祖父,却在上海虹桥路购置了不动产。祖父一生从政,一生清白,唯一的积蓄就是那笔变卖了南京私宅的房产所得,部分已用于上海的生活花费,而这又“不识时务”地把这些积蓄全用在了购买不动产上,着实令众多亲戚朋友想不通。今天回头再看,祖父用心良苦,用这不动产的永久契约来表达他不想离开祖国的心声。

(实习生 朱旻明 整理)

外交官远赴南洋筹战款

高帆